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维特档案

第一卷(上)

——访问记 笔记

ИЗ АРХИВА С. Ю. ВИТТЕ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Рассказы и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запись
Рукописные заметки

[俄] 谢·尤·维特 / 著

李 晶 杨怀玉 / 译
张 丽 叶柏川 王福曾

李玉贞 / 审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维特档案

第一卷（上）

——访问记 笔记

〔俄〕谢·尤·维特 / 著

李 晶 杨怀玉 / 译
张 丽 叶柏川 王福曾

李玉贞 / 审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ИЗ АРХИВА С.Ю.ВИТТЕ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Рассказы в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записи

Рукописные заметки

Дмитрий Буланин С.-Петербург 2003

本书根据圣彼得堡德米特里·布拉宁出版社2003年版译出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出版委员会

主 任	戴 逸
执行主任	马大正 崔建飞
委 员	卜 键 朱诚如 成崇德 郭成康 徐兆仁 邹爱莲 潘振平
学术秘书	赫晓琳 李 岚

总 序

纂修清史是我国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它包括3000余万字的清史主体工程及文献、档案整理和编译工作。广大史学工作者正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努力做好清史编纂工作，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世界各国从分散发展到趋于一体，大抵从15世纪、16世纪开始，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和世界体系。清朝从1644~1911年共延续了268年，这是世界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的转折时期。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却依然以“天朝大国”自居，闭关自守，使封建社会的中国越来越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洋枪洋炮面前不堪一击；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18世纪世界历史的大变局中，康乾盛世

不过是中国封建社会“落日的辉煌”，而到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清朝日益衰颓，已奏起了“落日的挽歌”。因此，研究清史，确定它的基本内容，以及确定研究它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时，不能脱离清王朝社会发展过程中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

在编纂清史时要有世界眼光，这已是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不仅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既要着眼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而且还要放眼世界，博采众长，搜集和积累世界各国人士关于清代中国的大量记载，汲取外国清史研究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正是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决定编辑出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以下简称“编译丛刊”）。

清朝建立之初，与世界各国曾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接触。后来中国的大门一度被关闭而后又被强行打开，这期间，外国的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军队、探险家、科学考察队蜂拥进入中国，东方古国的一切都使他们感到惊奇。基于种种不同的目的，他们记录下在华的所见所闻。这些记录数量浩瀚，积存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或私人手中，成为了解清代近三个世纪历史的珍贵资料。由于西方人士观察、思考和写作习惯与中国人不同，他们的记载比较具体、比较广泛、比较注重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方面，因而补充了中国史料记载的不足。“编译



丛刊”将从中选取若干重要资料译介给国内的读者；对早年问世的具有开拓性、奠基性价值，但不为中国学术界所熟知的作品，我们也将同样给予关注；此外，对反映当代国外清史研究新的学术思潮、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和重要成果的学术专著，“编译丛刊”也将及时地介绍给中国学术界。

从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出发，有选择地介绍国外新史学的一些理论与方法是必要的。如西方历史学家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了”，主要是强调扩大历史学家的视野，拓宽历史研究的选题；又如提倡“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努力将社会精英的历史变成社会大众的历史，将千百年来隐藏在历史幕后的社会大众推上历史的前台。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研究整体化趋势的推动下，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学分支学科，如社会史、人口史、民俗史、新经济史、新政治史、心理史、社会生态史、环境史、妇女史、城市史、家庭史等等，对于纂修清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这些都将在“编译丛刊”的作品中有所体现。

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不同文明间不断交流和融合的历史。任何国家的文化都是通过与异质文化的对话和交流获得营养，从而不断发展壮大。纂修清史必须排除闭关自守的文化排外主义的干扰，破除中西对立的僵化思维方式，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对待国外清史研究的一切成果，因为它们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愿“编译丛刊”在新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广阔背

景下，作为一座文化的桥梁、友谊的桥梁，为纂修清史做出更多的贡献。

于 沛

2004 年 5 月

译者前言

本回忆录作者谢尔盖·尤利耶维奇·维特（谢·尤·维特）伯爵，是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时期的宫廷重臣：1892~1903年担任俄罗斯帝国财政大臣，1905~1906年任俄国首位大臣会议主席。1915年2月28日在圣彼得堡辞世。不言而喻他是这两个王朝许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也是沙皇许多重大决策的目睹者和一定程度上的参与者，特别是1905年10月17日宣言的起草和十分脆弱的君主立宪的出现，日俄战争和1905年《朴次茅斯和约》的签订，以及战后为恢复帝俄经济而争取到的巨额国外贷款。

谢尔盖·尤利耶维奇·维特的名字为中国读者知晓，多半与他曾经代表俄国政府与李鸿章谈判修建中东铁路一事相联。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大型回忆录，则十分详细而全面地记述了沙皇如何从其所谓“国家安全”考虑修建中东铁路，并从俄罗斯需要不冻港而策谋侵占中国东北，攫取旅顺大连。维特描述的史实，如仅仅利涅维奇一人就在抢劫故宫后从中国运回了十车厢“战利品”，主要是珠宝，这足以说明沙皇的对华政策。维特关于俄罗

斯与英国、日本在远东的角逐，以及他前往朴次茅斯与日本代表缔结和约的过程，对于研究后来苏联对远东国家的政策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史料。本回忆录内容之丰富，涉及重大内政外交问题之深度与广度，诸如国内的动荡、流血的星期日、1905年10月17日宣言的发表以及日俄战争等，交相辉映，构成罗曼诺夫王朝在风雨飘摇年代里大厦将倾之际俄罗斯帝国的“清明上河图”。

对于俄罗斯的国内政策，如犹太人问题、宗教信仰、言论自由、普选权、教育公平等，本书都有详细介绍。

维特关于20世纪初美国之行的描写，不仅为读者描绘了沿路风光，饶有兴味的是对于了解一个多世纪前美俄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差异，提供了多视角的图景。

维特以俄国社会为大背景展开自己的回忆，从出身家世说到官场沉浮。他把贵族和平民，追求改良乃至革命的人，激烈的或温和的党派，以及他们各自的政治主张与追求，逐一娓娓道来，没有修饰，平实中传达真情，且万花筒般令人目不暇接。冗长的叙述中也有闪光的情节，如李鸿章针对霍登事件大谈他的为官之道。尤其难得的是，维特因其身份而能在不经意间把沙皇本人及其高官显宦的生活状况，他们对社会事态的第一反应，以及他们的日常精神面貌轻松自如地展示给读者：尼古拉二世的懦弱，天罗地网式的新闻检查和文字狱，警察制度的严酷及其对社会生活的粗暴干预，各阶层对争论不休的尼古拉二世改革（1905年10月17日宣言）的态度等。

就是通过这一切，维特也不经意间绘制了一幅极好的自画像，展现了自己的面貌：一个“真诚拥护”帝制并一向致力于“维持至高无上”的沙皇权柄的保皇派。维特原原本本地记载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和高层动态，如俄国人因不堪政治无权、民生凋敝，或结党活动，或斩木揭竿“打土豪分田地”，或轰轰烈烈举行罢工等，



在维特指尖汇成的是一股“革命浊流”，参与运动的学生成了“渣滓”，他甚至认为这些革命组织若不割掉“革命的尾巴”就没有前途等，不一而足。十月革命和苏维埃俄国的出现似乎一度证实了维特的预测，被维特咒骂的政治势力成了气候，但几十年后苏联的解体又不可避免地把人们引入无限的思维空间。

要写自己的政治经历，维特回忆录的画布上当然离不开皇上、宫廷重臣和他们的政治主张：其共同点是维持皇权，改革可以，但要按照10月17日宣言，实行君主立宪制。绝不走马克思主张的暴力革命道路，在保持沙皇统治的前提下逐渐改良俄国社会，这使人想起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维特用很多篇幅再三强调10月17日已经给了公民自由，提出了普选制，开启了宽容的宗教政策等，他苦口婆心地劝告其同僚，哪怕放弃些许利益，退一步海阔天空，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否则社稷不保，“自下而上”的群众革命，特别是土地革命和他污蔑为“渣滓”的工人的革命将把皇室和王朝吞没在“革命的浊流”中。

在这方面，书中关于尼古拉二世把农民和农业问题重重拿起轻轻放下的记述尤其发人深省。作为一国之君，沙皇尼古拉二世鉴于农业的落后状况一直是俄国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有意建立一个农民问题的特别委员会，以启动此问题的解决。但是这直接触动了世袭领地拥有者的利益，遭到享有特权的贵族地主集团的反对，他们紧密团结起来，声称俄罗斯的存在就是为了“养活我们”贵族和富人。尼古拉二世选择了向富贵族让步的方针，从而阻断了任何改革的道路，社会动荡，民怨沸腾，结果他不仅于1917年二月革命后丧失皇权，而且1917年11月后不久，维特和权贵们仇视的“革命的浊流”把罗曼诺夫家族冲到了红色革命者刀斧下。整本回忆录像是为沙皇尼古拉二世唱的挽歌。

从农民问题的角度看，维特回忆录的中文版尤其显得饶有兴味，亚历山大三世的改革固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俄国农奴受到的

压迫，可是到尼古拉二世继位后的几十年里，这一举措对俄国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毕竟十分有限，农奴作为商品可以转赠、可以买卖的状况是有所改变，但要使他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使这个“人”有真正的“我”的“感觉”，却是遥远的社会任务。具有浓烈俄国特色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和活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围绕着这个问题。第一方面是农民企盼沙皇成为“开明皇帝”，但屡屡失望；第二方面是各色知识分子提出种种激进或缓进道路；第三方面，则有贵族和整个上层的抱残守缺，自然还有沙皇谋求永远执政，甚至想把“革命”一词从“字典里抹掉”；第四方面则是几近失控的日益强烈的工农反抗。维特虽显零散但依然真实的记述，对国内外政界学界多少年争吵不已的革命道路问题，不失为一部重要的参考书。

对于中国读者，回忆录尤其具有启迪作用，因为长期以来人们被灌输的是由斯大林主持的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历时8年编写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中的观点，是列宁的观点。试以1905年革命为例。列宁认为那是“十月革命的总演习”。维特则把它称为“革命的浊流”并极其激烈反对苏维埃。事实是列宁在1905年就主张由俄国“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领导俄国革命。他反对沙皇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要求，称那是一种“迁延时日的、迟迟不前的、使人民机体中腐烂部分的消亡过程缓慢得引起万般痛苦的道路”。他主张用一种“迅速开刀、使无产阶级受到的痛苦最少的道路”，即推翻沙皇制度，并把“居民中的半无产者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使用强力打破资产阶级的反抗，并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列宁一派就这样在政治潮流中亮出了自己激进的旗帜。列宁的亲密战友Л. Д. 托洛茨基，就是1905年革命涌现出的精英，在圣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主席的位子上与沙皇斗争过。20世纪20年代初苏联将托洛茨基有关这场革命的文章集结成册出版了《一九〇五》，



其基调是热情讴歌激烈的工农运动。它给读者描绘的是与维特完全不同的景象。

1917年（俄历）10月25日俄国发生狂澜，苏维埃政权在革命的第二天颁布了《土地法令》，它表明，宫廷权贵们反对过的东西如苏维埃，成了新政权的基本制度和国策。俄国改良主义道路、尼古拉二世的君主立宪被历史否定了。从十月革命史研究的角度，维特的这本回忆录也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史料，引出新的线索，开阔了新的视野。

—

本回忆录因系维特的亲历，所以真实，因维特的显赫地位，所以重要。但自恃始终忠于皇上的维特，其回忆录的出版却因皇上而经历了坎坷之路。尼古拉二世早就知道维特回忆录的存在，在维特尸骨未寒时，密令查封了维特的私人档案。熟谙沙皇脾性和警察手段的维特对他敬爱的皇上也存有戒心，在手稿处理上棋高一着——把它放到了国外，躲过搜查，保存下来，后人才能看到他的回忆录。关于这段故事，原版前言已有交代。

回忆录的某些章节曾经在俄国面世，那是维特故去5年以后的事。

1976年，我国商务印书馆内部印行的《维特伯爵回忆录》是迄今为止研究者广泛使用的参考资料。这个版本的俄文编选者阿·亚尔莫林斯基显然为了避免原稿的重复而将回忆录的顺序重新排列、压缩，故难以反映这本巨著的全貌。

1981年，新华出版社也出版了《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维特伯爵的回忆》一书，取材与商务印书馆版本相同，但篇幅较小。

现在读者看到的回忆录是据2003年圣彼得堡版本译出的，编

者是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历史研究所和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以巴赫梅捷夫命名的俄国和东欧文化历史档案馆，依据的是后者收藏的档案，没有删减，据俄文原文刊印，悉数发表。

新译本的学术价值，除了维特的记述外，还因编者的详尽注释而锦上添花。难能可贵的是，编者使用了俄罗斯国家历史档案馆的丰富资料，引用了历史学家们的研究成果，把有关重大事件的要素，特别是沙皇的谕旨予以介绍，并把维特记述中的明显谬误处或予以纠正或提供佐证材料，对某些观点之评判，无不鞭辟入里。编者考据之精细，史料之确凿，高达全书篇幅 10% 的注释量，使回忆录的价值更加明确，甚至可以单独辑录成书。

三

现就中文译本在技术处理上做几点说明。

第一，本回忆录中经维特本人审校的部分，只有第一卷上册的第七章，约占全书的 3%，其他绝大部分维持着速记稿的原貌。所以内容经常有重复，语言不简练，叙事不严谨，颠三倒四，甚至出现观点和事实前后矛盾的情况。维特自己说，这是因为口述过程中他大部分时间身处国外，手边没有原始文件可资核对，仅凭记忆，难免有疏漏。本书一律照本翻译，不加任何标注。

第二，原文体例不一，第一卷上下册有章节目录。第二卷则以年代和地点为目录，但编排上有的年代在前，有的地点在前。译者将其体例统一处理。

第三，第二卷十分明显地保存着未经整理的口述语言风格和速记记录特色，上下文多有不连贯之处，再经翻译则直接影响了行文的通畅。书中许多半截句子，不少地方译者系据上下文揣测，甚至不得不修改原书明显的语言错误。为尽可能传达原意，译者请教了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前院长李英男教授，到中国来访问的俄罗



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阿·卡尔图诺娃（А. И. Картунова）、伊·索特尼科娃（И. Сотникова）和米·梅利尼科娃（М. Мельникова）等专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俄语部俄罗斯专家伊·雷日科夫（И. Рыжков）先生，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石川楨浩教授。谨对他们的帮助表示感谢。

第四，原书注释体例混乱，脚注、尾注混杂，注释符号和序号不统一，甚至出现只标有注释序号而无注释文字的情况，或序号与注文不符，或注释中再套注释，形成阶梯式注释，最离奇者是注释序号与注文相距达 20 页之远。译者只好把原文体例稍做改动并将其统一处理，除注有“——译者注”字样外，均为原书注释。

第五，原书附有人名索引，列出了人物的名、父名和姓，以及出现的页码。但所列官衔、姓氏与行文不一致处甚多，涉及长达几十年的俄政府高官，难以一一核对；书中所列人名特别是人物间的关系（如特列波夫家族），经再三梳理也无法捋出头绪，本书只能悉数照译。

原书涉及的各国人物范围广泛，而不同语种的国家姓名的组成、排列顺序都各有不同，还常带有冠词、缀词等，本书也按照原有顺序译出。但令人遗憾的是最终中文译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人名索引，因书中人际关系复杂，同一个人的姓名在不同的语境中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有时出现的是父名，有时是姓，有时是爱称，有时是全名。读者在上下文中并不难分辨讲话人的身份。但在电脑上搜索，按名、父名和姓把每一个出现的人物检索清楚，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故此，中文译本只好做了“人物简介”，供研究者参考。

第六，本书是两位老人和一个相当年轻的硕士、博士群体合作的成果。恭祝青年伙伴工作顺利，锦上添花。

译者（依书中章节顺序）：

第一卷 李晶晶（硕士，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翻译）；序

言，第1~2章。整理人名索引。

杨怀玉（博士，空军装备研究院翻译队副译审）：第3~7章及第二卷部分注释文字。

张丽（博士，辽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第8~15章，校对人名索引。

叶柏川（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第16~17章，该卷附录。

第二卷 王福曾。

李玉贞

2015年5月

北京东方太阳城